

状元解元合书如师校名

□白本

早年,我在旧书摊中购入一张老照片,上书:“苏北如皋师范学校高师部第四届毕业同学合影,1952.10.7”。名校如皋师范,创办于清末光绪年间,创办人是实业家、教育家、诗文家、藏书家沙元炳(1864—1927)。他是清末翰林,如皋近代第一贤达。我很珍惜那张旧照。究其原因,照中有“门”。我是1979年生人,小学就读如师附小,每日上学散学必过如师南大门。照中旧门,与我幼时所见新门已迥然不同。建筑一旦拆除,其貌其史,只能依附于旧照老书了。

如今,在如皋师范校园内,早已复建旧门,但和原门仍有不同。有照可见,老校门为中西合璧建筑风格,上部灰砖筑造,下部为拱形大门,门上装置一个白色灯泡。老门两边连接顶部为正方体的对称立柱,以及白色弧形墙面。引人注目的是,拱门上方有两块一小一大的长方形汉白玉石,分别镌刻“如皋”“师范学堂”校名。旧照年代久远,字迹不清,仔细辨认,校名隐约可见,其书师法苏轼,端庄大气。幸运的是,旧门已去,玉石尚存,置放在如皋师范校园内。如皋博物馆还藏有校名拓片,供人欣赏。

托人丈量,“如皋”两字分别长约60厘米,宽约50厘米;“师范学堂”四字分别长约62厘米,宽约58厘米。六个大字,何故大小有别?原来,如皋两字为状元张謇所书。师范学堂四字为郑孝胥所题。郑孝胥(1860—1938),近现代诗人、诗学家、书法家。他还是光绪八年福建省正科乡试解元。他与张謇、沙元炳,均有交游。1907年,作为大生纱厂古董的郑孝胥,携手友人李拔可(清末举人、诗人),有通如之旅。若说至通倾向公务,郑氏奔波于董事会议、参观景点,那么来如偏重私谊,郑氏忙于会见友人。

查阅《郑孝胥日记》,1907年9月3日,郑孝胥偕李拔可,乘坐大达公司小轮自通出发,途中遇周子迪、张树屏(1871—1909,沙元炳友人与助手,如皋师范创办人之一)等如皋文人。下午两点,小轮抵达如皋,张树屏安排郑孝胥、李拔可入住观音堂僧房。晚去知县周松孙家吃饭。翌日上午,郑孝胥、李拔可又拜会沙元炳、张树屏,“作联扇数事”,观赏《水绘园补契图》《冒巢民小像》。中午,又拜访周子迪、周子固兄弟,又作字数幅,并接受周家盛情款待。饭后,沙元炳、周松孙、张树屏、周子固等人相送郑孝胥(郑太夷)、李拔可登上小轮。沙元炳作有《送郑太夷返沪江》(录入《志颐堂诗文集·诗卷二》):“……半席清谈跨海县,满空凉雨黯关河。留诗未尽平生事,临睨风云眼几摩。”由诗可见,沙元炳、郑孝胥诸友在如所谈国事甚多。时为清末,为救国救民、造福乡梓,沙元炳才创办了如皋师范学堂。尽管郑氏日记中未曾写明题写“师范学堂”一事,不过“作联扇数事”中,应有可能包括题写“师范学堂”四字。日后,张謇又补写“如皋”两字。

进士办学,状元、解元题名,如皋师范无愧于百年老校的美名。



史海回眸

“盘基墩”案争始末

□林炳堂

海门区正余镇的西北处曾有个盘基墩村(后与正通村合并现名为正基村),原是海边荒滩,因盐墩多如树根盘绕四周,被称为“盘基墩”。清末,盘基墩所处是一片斥卤荒滩、蓄草供煎之地,面积24顷82亩(2400余亩)。前为东渐书院之公产,收到的租息充该院课士膏火。后书院停办,财产遽以办公共事务不察宗旨为原则,经南通县议会议决由县知事收回,作为县教育基本财产,租息专备学务经费。

民国三年春,学务会员李止愚查点,租息每年只有一百七十六千文,提出将该墩入股,作为大有晋盐垦公司股本,年息充当县教育经费,可增加收入。张謇、张謇两公顾全公益,按时值每亩作价一元余,作股本三千元,拟为三股。方案确定后上报县府审批。方案经南通县储知事批准,并致公函请余东场马知事查照办理。于是呈请两准运盐署派员厘剔,确定范围。旋由公司签发股票、息单,呈由余中场马知事咨送县署核收。

此后,教育方每年按股取得股息,至民国十年,已获得股息近二千元,已及股本三分之二,同时各方分得公司股田均颁有部照。至此,以墩入股似乎一切顺理成章。

然而到了民国十九年冬(1930),时任教育局长管劬丞到省教育厅,说“该荡地昔年入股系私人之所为,且地价过廉,迭涉侵占,完全非法,责令公司将原地交出,由该局接收,并算还历年盘算”等,欲图推翻成案。并通清县府遵照教育厅行文文收地。大有晋公司则认为以地入股,得有代价,执有股票,分有部照,收有租息,公署已知,手续完备,合理合法。教育局企图凭空推翻成案,当然不能接受。但迫于教育厅的压力,县府数次下令向大有晋公司施压。大有晋公司据理力争,寸步不让。

无奈之下,县长张公只得召集双方会议,并赴西亭面约当年学务会员李止愚偕同到城。由李从中申说当时情形,但也无效果,会议无形停止。

民国20年3月,省教育厅再向县府下达训令。这次以厅督学易作霖视察该县教育状况为由,飭令县府退还地,以维护教育利益。易督学提出了收地的六条理由,仍与教育局长管劬丞如出一辙,主要是:当时由私人勾结,恃强吞产;作价便宜;手续不合;田产租息不一致;迫于势力所压,等等。大有晋公司摆出事实,一一加以驳斥,弄得县长骑虎难下,只得委派陈县委赴实地调查。

陈县委是个仔细之人,他先阅全卷,随赴公司将教厅易督学和县教育局管局长所驳各条逐一诘问,由公司分别答复。他认为,以表面来看,不能认为公司方毫无理由,但仅凭其一面之词也不能置信。他认为此案的两个关键须弄清:一是当时以地入股究竟有无私意,二是所作地价是否故意低廉。如一经得有实据,公司就会心服口服。于是陈县委周咨博访,了解实情。对于第二点,他设法探访诸老农之口,都说该处当时确属蓄草供煎之荡地,每亩价值一元有余,尚不为少,确系实情。而对于第一点,双方各执一词,难以证明。他建议县府,时经办人、前特别会计薛儒人在通城,可就近传到,令其据实陈述,以期彻底明了,早日了结此案。

根据陈县委的建议,民国二十一年夏(1932),经由三区区长费君侠、昔年原经手人薛儒、李止愚出面调解,结果为:大有晋公司将应收取的清债加股款的1500元,作为补助教育事业之经费,不再收取;县教育局撤回议案。

1933年12月22日,大有晋整理委员会会议决议:盘基墩案照结。纷争一时的盘基墩案终于尘埃落定。

张纯如祖父张迺藩:民国最后一任南通区专员

□羌松延

张纯如,一个应该让所有中国人记住的名字。她用一生为南京大屠杀亡灵奔波,向世人揭露那段被掩盖的真相。今年11月9日适逢其离世20周年之日,在缅怀致敬她的同时,笔者要介绍一位民国时期的南通区专员,他就是张纯如的爷爷——张迺藩。

上图左起:张迺藩像(淮安市张纯如纪念馆供图);童年张纯如(右一)与家人合影(前排左一为张迺藩);“江苏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”徽章;1948年3月,张迺藩根据上级部署拟写的进驻阌家庵、四甲坝、余东密令(原件藏南通市档案馆)。

张迺藩(1906—1998),字筱武,生于江苏涟水县西路市(现为淮安市淮阴区新渡口街道)。1930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。1933年出任宿迁县长,任内曾建“马陵公园”;征聘名士普硕挖掘、搜集文物古迹,借以激励民众爱国热情;他还晋省请愿恢复由张謇等人推动创办的繙徐玻璃厂,以开发苏北实业,促进徐淮繁荣。1937年春,张迺藩调任太仓县长。同年8月,淞沪战役爆发,他在战火中坚持做好劳军与安置难民等支前工作,直到11月上旬日军侵占苏州,才随军队西撤重庆,任重庆国民政府(蒋介石)侍从室三处专员。抗战胜利后,张迺藩先后担任盐城、南通两区专员公署专员。据载,他“办事干练勇毅,深为极峰激赏”,在地方为官,则“勤政为民,有着很好的口碑”。

张迺藩在通任职始于1947年。当年9月,南通市新任县长沈乃庚与第四区(即南通区)新任专员张迺藩接连抵通接篆。其中,张氏于20日由东台莅通,下榻新生活俱乐部宾馆后,当天便与南通各界人士“恳谈甚久”。

作为江苏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,加上又正值国共内战之际,张迺藩自然少不了必须完成一些规定动作。如主导在通的

国大代表、立法委员选举,主持修建南通城防工程等。但因那时的军事指挥以驻通的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司令李默庵为主,故其工作重点是在“充实基层政治、整理地方财政、建筑保安城寨”等方面。从现存与他有关的史料来看,张专员更多关注的是南通地区的民政、建设与社会等事宜。

当年因为战事频仍,周边大量农村难民涌入南通城。报载1948年2月,张迺藩“对流寓通城之各地难胞,甚表关切,除指飭关系机关觅定房屋,辟为招待所,使其不至流落街头、餐风宿露外”,还偕同有关人员“亲赴难民招待所视察”。同时,为减轻难民生活重压,他“与各方研究具体办法,择年富力强者从事地方临时建设工作或工厂生产事业(如中纺公司检花工之类)”,通过各种举措,努力解决难民的吃住问题。3月,专署又召集各机关首长、宗教慈善团体代表及地方士绅,召开难民救济会议,并在张迺藩报告救济难民情形后,决定“于南通县东、西、南门三处,各设粥厂一所”。同时明确“在芦泾港另觅收容地点,难民卫生由卫生院切实负责”等。

尽管时局不靖,但张迺藩仍不忘生产建设。1948年3月12日,专署在南通学院操场举行纪念植树活动,“张专员、

陈(赓尧)县长于细雨蒙蒙中亲自植树,沿公路一带均由各镇保甲人员栽植果树”。3月26日,张专员在公署开会,专门讨论南通区棉花生产合作贷款一事。此外,张迺藩与南通地方人士亦互动良好。1947年12月,南通县长钱笑吾去世,张迺藩亲往吊唁并撰挽联:“敬恭桑梓,事业昭昭垂不朽;泪湿江城,薤歌处处见哀荣。”其父张益斋当月在淮阴去世,南通地方士绅等发起公祭,张迺藩则登报表达谢忱。1948年1月,为张汇川老先生上乡谥匾,张迺藩与通城士绅联名发布公启……

随着各地民主政权在苏四区农村建立,1948年6月,江苏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因无法推行“政令”,奉令裁撤。张迺藩由此成为民国时期南通区最后一任专员(共有十任)。

离开南通后的张迺藩,于当年冬经香港前往台湾。在台期间,曾先后担任私立元培医专校长与“教育部”参事、主任秘书等职。但他最为成功的还是对子女的培养:三个儿子(长子张绍远、次子张绍迁、三子张绍进)均在台大毕业后留学美国,且事业有成。其中,张纯如的父(张绍进)母均为哈佛大学博士、大学教授。而张纯如更是张家的骄傲,其1997年出版的《THE RAPE OF NAN-

KING: THE FORGOTTEN HOLO-CAUST OF WORLD WAR II》(《南京大屠杀:被遗忘的二战浩劫》,简称《南京大屠杀》)一书被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廉·柯比认为是人类史上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。

然而,该书著者张纯如如是一位在美生长、拥有华裔血统的美国人,按说她对故土或中国的感情远不及父祖辈深厚,那又为何能如此执着地揭示出这段沉重的中国历史呢?她曾坦言:“在我的整个童年,南京大屠杀一直深藏于心,隐喻着一种无法言说的邪恶。”查张纯如生于1968年,张迺藩则于1976年6月退休后移居美国,与子女一起生活。值得一提的是,尽管张纯如生长在美国,但她的中文却非常流利。据记载,“这得益于她的祖父张迺藩的教导。张迺藩经常会给孙女讲述中国的故事,尤其是自己年轻时曾经在江苏任职的经历。他亲眼见过日军侵华时期的暴行,那段历史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因此,他时常提醒张纯如,一定要牢记自己的根,不要忘记那段黑暗的历史”。即张纯如的那份童年记忆,主要来自子祖父等人的讲述。由此不难想见,张纯如选择写《南京大屠杀》(中文版书名《南京暴行:被遗忘的大屠杀》),祖父张迺藩对她的影响是很大的。

皋东京戏杂谈

□赵一锋

众所周知,京剧是清乾隆年间“徽班进京”后,徽调、汉调、昆曲、秦腔、梆子等多种地方戏曲在北京汇聚、融合,结合北京的语言风俗发展起来,最终形成全国性的新剧种。如东旧称皋东,国粹京戏传入皋东已久。从晚清至民国到如今,在如东大地广为流传、极盛一时。

掘港、马塘、丰利、栟茶历史上是重要的淮南盐场。各场场官为场大使,管理盐务、民政、水利等,掘港又有主簿和绿营都司,他们来自全国各地,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,有的甚至是进士出身,乾隆年后随着京戏的兴起,大人们消遣娱乐大多离不开京戏。“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”,老百姓争相效仿。过去皋东民间有“放一台焰口超度一个亡魂,唱一台大戏教化一班百姓”的说法,正是由于戏曲的教化作用,封建朝廷也乐得接受并大加鼓励,民间戏曲发展进入繁盛期。

旧社会艺人很苦,有“台上戏子,台下花子”的说法,一副纤板、两行车辙,浪迹天涯,常常以庙为家。逢菩萨生日或节庆,定期为庙里演出,如中元节(盂兰盆会)由镇上大商号出资演出《目连救母》,关帝生日演出《水淹七军》等。

皋东地区解放前没有固定的戏园子,演戏都在庙宇固定戏台或者临时搭建的台子上,也有官宦富贾之家在大门堂里演堂会。掘港街上有城隍庙、关帝庙、火星庙、上真观、都天庙、大王庙、天后宫、东三元宫八处戏台。城隍庙戏台宽大,山门外宽阔,东西厢楼,台下有广场,条件最好,演戏也最多。当年张謇先生到掘港束公馆大豫公司办事处公干,闲暇之余常去城隍庙看戏,有次去得晚了宁可站在后面,也绝不肯让人找熟人让座。散戏后,班主认出了张謇,急忙打招呼,张謇笑道:“总先来后到的,来晚了就该在后面。”看戏的观众听后齐声鼓掌,久久不肯离去。掘港天后八总庙、芳泉庙、野营角等也有戏台。八总庙戏台

建于清康熙年间,系下海渔民出资建造,规模较大,可容纳千人观剧。戏班子常常在庙门口放一竹扁,旁边竖一牌子,写上四个字“君子自重”,给不给钱、给多少都由观众决定,老艺人的辛酸可想而知了。过去掘港街上就有了一句歇后语:“开门戏好看一难等!”讲的是正戏结束前10分钟左右,不再收票,任人进内看“开门戏”,这种传统延续到后来的电影院。

过去戏班子之间常唱“对台戏”,即两个戏班子在同一时间地点,分别在两个相对而立的戏台子上演出。这是对戏班子演出水平的挑战,完全由观众情绪决定,虽然胜负方不会受到奖励和处罚,但往往胜的一方声名大震,败的一方可能一蹶不振。老艺人赵长保少年时就在掘港东三元宫唱“对台戏”饰演武松,凭借精湛武艺一举成名。

皋东旧时戏班规矩很多,如:新到一地必要“祭台”,即由班中武生杀鸡祭祀舞台,祛除不祥;班中供奉“家祖”,据说唐明皇,对联是“金口玉言梨园主,龙生凤养帝王家”,唐明皇创造了丑角,故此丑角的地位高,丑角不化妆,其他角色不好化妆;饰演关公的演员,演出前必须要斋戒三日,演出当日焚香沐浴等;戏班子学艺称为“坐科”,学艺一般五年。“坐科”很苦,徒弟练功时,师傅一步不离,还要反复示范,比其他行业都辛苦,满师后半年收入归师傅所有,师傅则送几本手抄戏本作为回赠。

旧时皋东戏班子班规森严,如有成员犯规,必要“坐公堂”共同商议。一般

由总管(戏班负责人,相当于职业经理)召集并坐首席、班主坐二席、大花脸坐三席、四席以下按演员顺序坐,根据班规当场决定处罚结果,一般是打屁股。班规不是维护班主的,而是管理班内一群人,班主违规也受罚。老艺人赵长保曾说起某次其祖父犯了班规,当总管的父亲也“坐公堂”,否则人心不服,戏班子要散的。

皋东历来京戏票房林立,票友水平高。解放初仅掘港就有大大小小票房十几个,以理发业(过去称“飘衣行”)的为主,往往由琴师组织。掘港老街最后一个传统票房——南街上的王家票房直到2016年王师傅去世才停办,笔者有幸去要过几次。有的票友水平很高,不亚于专业演员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南通梨园行内曾盛传“戏班子最怕过掘港和石港”的说法,一般的戏班子到掘港、石港两地,首先得拜会当地梨园行的角儿,如掘港的杨洪春、赵长保、曹少洪等,再演上一两天的戏。如能得到票友观众的认可就站稳脚跟;如得不到认可,便有票友喝倒彩甚至上台指点,戏班子只得卷铺盖走人。

民国初年,掘港街上何镜记八仙行老板何杏儿酷爱京剧。一年从上海请来麒派(周信芳)老生沈善仁在城隍庙演出《萧何月下追韩信》,萧何追了一程唱道“五十余里路已遥……”台下倒彩哗然,叫“萧何下台,跑得太快”,沈善仁一头雾水,下台后才知道是唱词出了问题。原来掘港票友熟悉马连良(马连良)《萧何月下追韩信》,唱词是“听说了四十遥,又见月影树上梢……”认为沈善仁唱错

了。第二天,沈善仁跑到城隍庙外校场桥上脱下头上的礼帽,包上一块砖头丢到串场河里,发誓“等礼帽浮上来,再到掘港演戏”。几年后,何杏儿去上海邀沈善仁找到周信芳,还说了事情经过,周笑道:“我们都不是汉朝人,不知萧何追了多远,数字只是表示萧何的急切心情,“没在戏”后来为了避免观众误会,马派和麒派将唱词统一为“数十里路已遥,又见月影树上梢……”至此一段梨园公案了结。老掘港流传“何杏儿清的萧何——跑得快”的歇后语。

1919年,梅兰芳大师应张謇先生之邀赴南通通俗剧院献艺,当时票价是二十元至五六十元不等,当时一个普通店员月工资也仅有十元,黑市价格炒到一百多,当时的掘港票友组团观摩切磋,这段佳话一说就是一百年。

1944年,管惟炎(解放后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,中国科学院院士)等发起成立黄海剧团,演出现代文明戏的同时,常常演出京戏,宣传革命思想,配合党的各时期中心任务,至今黄海剧团仍活跃在如东大地,是全县精神文明的一面旗帜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,各票房陆续停办,代之以革命宣传队,掘港的“大联总”宣传队常年演出革命样板戏,京剧票友纷纷加入。改革开放后,各票房陆续恢复活跃起来,票友的水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鲍小华、颜伯庆等如水平票在全国比赛中屡屡摘金夺银,水平丝毫不输专业演员。

除票房演出京戏外,民间还有僧道在法事活动中演出,常演出的剧目有《群英会》《定军山》《武家坡》《捉放曹》等,没有统一形式,群众喜闻乐见,深受喜爱。

光绪三十年(1904)张謇等人另择唐家闸鱼池港北隙地建设新堂,光绪三十二年(1906)堂成,占地面积24亩,建筑皆系新式洋房,内设幼稚园和国民初等小学堂。初期,育婴堂入幼稚园幼儿68人,此举为全国首创。原城内有育婴后改为北濠小学(1975年北濠小学并入实验小学)。民国27年(1938年)3月,日军侵占南通,唐闸育婴堂为日军焚毁殆尽。

诊,育婴堂给付工资。地方官员及社会爱心人士对育婴堂多有关心。常有无子女家庭到堂内抱领婴幼儿,被抱领的婴幼儿视育婴堂为娘家。无人抱领的孩子则在堂内食宿,上学读书或学习手工,长大后自食其力。

通城育婴堂巷

□任涛

婴堂收养的弃婴患先天性疾病者较多,再加上疾病传染等原因,死亡率较高。同治十三年(1874)知州梁悦馨在城隍庙内设立保婴局(保婴会),广泛募集资金资助育婴堂,以维持其正常运转。

清末,南通育婴堂拥有一定的田产,这些田产来自富户的逐年捐赠。其地有民田(种植粮棉的田)、灶田(晒盐的田)、沙田(江边新涨的田)若干。这些田租收入,用于婴儿饮食、衣服,管理人员和奶妈的工资。

咸丰以前,育婴堂收养婴儿及接受其他小城镇转婴堂转送婴儿两百余名;堂内奶妈二十多名,每人月工资一千一二百文。同治年间,经过内部整顿挖潜,

婴儿增至千余名,堂内奶妈五六十名,人均月工资一千五六百文,外加三四斗大米或一石大麦。农村奶妈领回家哺养,每个婴儿给钱四百文,如细心照料,另加赏钱一百文。

育婴堂收养的多数孩子是穷苦人家无力哺育的婴儿,也有少数是父母不愿抚养的私生子女或是先天性残疾的孩子。育婴堂作为社会慈善机构来者不拒。育婴堂在门口墙上开了一个小洞,上方装有挡雨的小棚,夜间堂内有人在里面值夜,以便随时接受从洞中送入的婴儿。堂内接受的初生婴儿分别由奶妈哺乳。断奶后,另有干妈照料。光绪年间,堂内设有坐诊医生,为婴幼儿看病问

打开民国时期南通城厢地图,一眼就能看到在城厢西北角有条东西向的育婴堂巷。这条巷道因此地的育婴堂而得名。据老人们讲,在这条老巷道,先后有数万名弃婴得到救助。

查阅地方史料,清康熙三年(1664)郡人段茂乾、刘昌祚等于州治西首天妃宫创建育婴堂,建乳房两间,供养室数间。百余年之后,到了乾隆三十九年(1774),原有的育婴堂房屋破旧不堪,随时有倒塌危险,时任知州荆如棠、士绅刘士宏等决议动用社会力量,在州治寺街西北首新建育婴堂,经多方筹资,建乳房、供养室、廋房等百余间。嘉庆十七年(1812)知州唐仲冕增建乳房17间。育